

上卷

二十世纪

ERSHISHIJI
ZHONGGUOSHI

中国史

● 主编 李云峰



西北大学出版社



本书出版受国家教育部“新世纪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和
西北大学首届教学基金项目支持

二十世纪中国史（上卷）

● 主编 李云峰

著 者（按姓氏笔画排列）

门秀芳 王国红 刘东社
汪春劼 张天社 李云峰
陈舜卿 赵钧强

西北大学出版社

中国·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世纪中国史/李云峰主编.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3.4

ISBN 7-5604-0567-3

I. 二… II. 李… III. 中国-现代史-20 世纪-高等学校-教材 IV.K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0004 号

二十世 纪 中 国 史

(上、下卷)

主编 李云峰

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校内 邮编 710069 电话 8302590)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开本 56 印张 1300 千字

1993 年 9 月第 1 版 2003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604-0567-3/K·84 定价: 78.00 元(上、下卷)

目 录

引 论：	二十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	/1
------	-------------	----

第一章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1901~1912)	/8
-----	--------------------------	----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	/8
	一、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	/8
	二、中国新生社会力量的初步发展	/11
	三、戊戌维新和旧式农民运动的命运	/13
	四、清朝政府的新政改革	/19
	五、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	/21
第二节	打落皇冠的辛亥革命	/25
	一、孙中山、同盟会与三民主义	/25
	二、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与国会请愿运动	/30
	三、辛亥武昌起义与全国响应	/34
第三节	民国的成立和民主共和制度的建设	/37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37
	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39
	三、民初改革与社会生活的变化	/41

第二章	北洋军阀的统治与人民的新觉醒 (1912~1919)	/46
-----	----------------------------	-----

第一节	民主共和制度的蜕变	/46
	一、袁世凯与北洋军阀的形成	/46
	二、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49
	三、参议院风潮及其构成的变化	/54
	四、内阁风潮与责任内阁制的被破坏	/56
	五、民国初年的政团政党奇观	/60
	六、第一届国会的选举和召开	/65
	七、袁世凯的独裁、称帝与反袁斗争	/71
第二节	皖系军阀的统治与全国政局	/80
	一、皖系政府的成立和国会的恢复	/80
	二、府院之争、张勋复辟与国会再次遭难	/80

2011/47/06

三、孙中山的护法斗争与西南军阀的破坏	/82
四、段祺瑞的卖国与独裁	/83
第三节 中国人民的新觉醒	/84
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84
二、马克思主义的初步传入	/89
三、革命风暴的酝酿	/90

第三章 五四运动与皖直军阀政权的更替 (1919~1923) /94

第一节 五四爱国运动	/94
一、幻想的破灭: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	/94
二、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各地的响应	/97
三、从六三到六二八	/100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崭新风貌	/104
一、文化思想界的百家争鸣	/104
二、社会主义思潮的澎湃及走向	/107
三、关于社会改造和国家出路的论争	/111
四、新文学革命的丰硕成果	/117
第三节 军阀混战与直系军阀的统治	/119
一、华盛顿会议与列强的卷土重来	/119
二、直皖战争和皖系政权的垮台	/121
三、直奉战争和奉军败退出关	/123
四、吴佩孚的“法统重光”和曹錕贿选	/126
五、国民经济的停滞衰落和人民生活的每况愈下	/130
第四节 国共两党的建立与合作的酝酿	/131
一、从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	/131
二、孙中山的二次护法及失败	/133
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134
四、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和初期农民运动	/139
五、国共合作的酝酿	/142
六、二十年代科学与人生观关系问题的论争	/144

第四章 国民革命与北洋军阀的溃败 (1924~1927) /148

第一节 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国民革命的勃兴	/148
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48
二、国民革命的勃兴	/150
三、全国政局的演变与两大人民运动	/154
四、国民党内部的分化与中共的对策	/159

第二节	全国革命高潮	/162
	一、席卷全国的五卅运动	/162
	二、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和国民政府的成立	/165
	三、第三次直奉战争与北方的反奉倒段运动	/166
	四、反对国家主义派的斗争	/169
	五、反对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与妥协	/171
第三节	北伐战争	/178
	一、北伐的准备和出师	/178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	/181
	三、工农运动的高涨	/184
	四、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188
第四节	国共两党的分裂与国民革命的天折	/191
	一、列强的干涉与革命阵营的分裂	/191
	二、蒋介石集团的“清党”反共	/194
	三、武汉地区的讨蒋运动和继续北伐	/197
	四、汪精卫集团的“分共”反共	/200
第五章	国共对垒与局部抗战 (1927~1937)	/206
第一节	南京政府在全国统治的确立	/206
	一、国民党北伐奉、鲁混战争斗与统一	/206
	二、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体制	/212
	三、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和封建法西斯制度	/216
	四、南京政府的初期外交	/219
	五、中间政派和国民党内的政治派别	/221
	六、国民党统治下的财政经济状况	/225
第二节	中共的武装反抗和土地革命	/231
	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创	/231
	二、掀起土地革命的高潮	/236
	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和苏区建设	/242
	四、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到长征的胜利	/247
	五、少数民族的革命斗争	/251
第三节	日本入侵与局部抗战	/252
	一、九一八事变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252
	二、一二八事变与淞沪抗战	/256
	三、伪满州国的成立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258
	四、长城抗战和中间阶层的抗日要求	/260
第四节	迈向联合抗日之途	/263

一、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	/263
二、国共两党政策的调整与合作的酝酿	/267
三、全国抗日救亡高潮的再度出现和绥远抗战	/272
四、西安事变和全国联合抗日局面的基本形成	/274
五、中外记者对红色中国的考察	/278
第五节 三十年代文化思想界的论争	/283
一、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283
二、中国本位文化和全盘西化的论争	/286
三、左翼文艺运动及其两场论争	/288
四、新启蒙运动的开展	/292
第六章 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1937~1945)	/294
第一节 全民族奋起抗战	/294
一、全国抗战的爆发与国共再度合作	/294
二、国共两党的抗战路线	/296
三、华北抗战	/299
四、中日谈判的破裂与近卫第一次声明	/300
五、华东华中的抗战	/301
六、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成立和敌后战场的开辟	/302
七、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和国际援华活动	/303
第二节 坚持团结抗战和反对分裂投降	/305
一、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与国民党的倒退	/305
二、正面战场的继续抗战	/307
三、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310
四、反对国民党的反共行径	/312
五、国民党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和宪政骗局	/315
六、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	/317
七、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论争	/318
第三节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中国战场	/319
一、珍珠港事件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结盟	/319
二、中国战区的设立与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321
三、日军的“治安强化”、“清乡”和生物化学战	/322
四、解放区军民克服困难坚持抗战	/324
五、制止顽固派的反共叫嚣和武力威胁	/332
第四节 战略反攻和最后胜利	/333
一、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和联合国的成立	/333
二、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的反攻	/334

三、解放区战场的局部反攻	/335
四、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一次大溃败	/337
五、史迪威事件和美国对华政策的逆转	/339
六、国民党统治的危机和人民民主运动的增长	/341
七、代表不同中国命运的两个大会	/344
八、中国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347
第七章 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 (1945~1949)	/352
第一节 内战独裁与和平民主的抉择	/352
一、战后时局与国共两党的方针	/352
二、重庆谈判和停战谈判	/355
三、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和成就	/359
四、国统区反内战运动的兴起	/361
五、国民党加紧内战部署与中共的准备	/364
第二节 粉碎国民党的军事进攻	/368
一、全国内战的爆发	/368
二、粉碎国民党的全面进攻	/369
三、伪国大的召开与国共关系的彻底破裂	/371
四、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	/374
五、国统区的危机与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376
六、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和新疆的三区革命	/381
七、黎明前的文化论争与文化指向	/382
第三节 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	/385
一、解放军举行全国性的反攻	/385
二、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	/387
三、中共夺取全国胜利的行动纲领	/389
四、国民党的“戡乱总动员”和“行宪”丑剧	/390
五、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扩大	/393
第四节 中国民主革命的辉煌胜利	/395
一、伟大的战略决战	/395
二、国统区财政经济的崩溃	/399
三、将人民革命进行到底	/402
四、人民共和国在炮火声中诞生	/406
五、历史性的选择和划时代的胜利	/409

引 论

二十世纪前的中国与世界

《二十世纪中国史》，是将20世纪作为一个大的“断代”、一种时空框架，从具体与整体的结合上分析、研究和记述这个世纪中国历史的著作。该书分为两卷：上卷起自1901年八国侵略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勃兴，迄于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相当于中国现代史；下卷起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迄于20世纪末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为了更好地学习、理解和把握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有必要从宏观上追溯和认识这个世纪之前中国的基本情况，特别是19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中国与世界之间相互关系的演进。下面，仅就这两个问题做一概括地论述。

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

无论就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着眼，还是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来说，1840~1842年的中英鸦片战争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正处在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统治之下。这个王朝一共存在了267年（1644~1911）。它同以往的封建王朝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它的皇帝（年号先后为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都是满族人，在其统治下满族人享有某些特权。当然，这并不是说满族人之间都是平等的。事实上，所有满族人，包括最高层的官僚在内，都是皇帝的奴才。情况表明，清王朝一身而二任：既实行民族压迫，又实行阶级压迫。若以1840年鸦片战争的开始为界标，清朝前期的196年间依然是封建社会，清朝后期的71年间则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国封建社会源远流长，历经2000余年，由于诸多与西欧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条件而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社会结构。一般来说，作为一个大的系统，社会的内部结构是由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亦即意识形态结构）三个子系统的交互作用而组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以土地的表面私有与实质国有相重合为背景的地主经济和小农业与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在主体所属上，它是地主和农民的个体经济，但在很大程度上须受封建国家的支配，没有完全的独立地位；二是在经济活动上，它自给自足，“重农抑商”，不求于外。其政治结构是以中央集权为原则的大一统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家族宗法制度相结合的垂直隶属型官僚政治。这种政治的显著

特点：一是以伦理等级秩序（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根本，皇帝居于国家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具有统一信仰的封建士大夫（通过科举考试选拔）所组成的各级官僚，只对皇帝负责，下属只层层对上司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因而没有多少法治可言，主要依靠人治；二是重群体（如家族等）、重国家（即国家机器）而贬抑个人的人格、权利和价值，使大多数人成为工具，而不成其为人。其文化结构亦即意识形态结构则是以孔孟儒学为正统、儒道法佛等三教九流杂揉互补的文化体系。这种文化体系尤以儒学的“仁一礼”原则为中心思想，以“忠一孝”观念为现实要求，以“天人合一”的合观思考为宇宙观和方法论，以“中庸之道”（无“过”无“不及”）为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以“贵义贱利”为价值观。这种封建文化也有两个基本特点：一是就主体说，它是皇权主义、家长主义和小农意识的综合，本质上保守、狭隘；二是就文化本身看，它以缜密的理论形态规范了伦理等级秩序的和谐一致，反对非“分”超越和一切异端思想，所以在本质上又封闭、求同。以上三个子系统互为因果，相互适应，相互调节，但又以政治系统居于首位，政治高于一切，一切都被政治化，一切都以政治为转移，从而形成有别于西欧中世纪多元型社会结构的“大一统、定于一”的一体化社会结构。就社会结构的整体功能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而论，西欧中世纪多元型社会结构为资本主义的到来提供了方便的条件，它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温床；相反，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体化结构虽然创造过辉煌灿烂而又令举世称羨的农业文明，但却对资本主义的新因素起着排斥、否定和阻碍的消极作用，成为资本主义产生、成长的不易逾越的障碍^①。这既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保持大一统局面以及长期稳定、长期停滞的根本原因，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难以产生的真正秘密所在。

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观察，与在自身单一矛盾运动中完成近代突破的西方不同，当中国与古代揖别之时，清王朝面临的是远为复杂得多的内部矛盾激化和外敌入侵的双重危机。内部危机揭示了中国必须向前发展，冲决封建主义的藩篱，以实现历史性的突破；外部危机则表明，西方列强要征服中国，把中国纳入他们的资本主义体系，而一个国家落后了就要挨打，甚至亡国灭种。中国封建末世就处在这种难以解脱的双重危机交叉作用的困境之中。或许农民起义可以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但单纯的农民战争用血肉换来的不过是改朝换代的历史重演；或许没有外来因素的干扰，中国社会内部业已存在的商品经济的萌芽也将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但又不知要以多少个世纪的历史灾难作为代价。直到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社会没有能够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历史性的突破，所以外部危机的加深就成了中国步入近代的更为直接的原因。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既是民族的不幸又是历史转变的契机，它在客观上把中国从千年沉睡中惊醒，并以此为开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固有结构和发展方向。

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所带来的剧烈冲击，中国社会终于偏离了原来的轨道，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经济结构上看，外国列强通过逼签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设厂制造等特权。外来资本主义各因素的输入，首先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主要表现为小农业与手工业相

^① 曹锡仁：《幻想与现实：中国道路》，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6页。

结合的经济结构逐步被分解，农业的商品化也有所增长，其结果就为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某些条件（如商品市场、廉价劳动力等）。其次，民族资本主义企业虽比以前有了较快的发展，但因受外国资本主义的排挤和中国传统封建主义的压制，其发展不仅屡遭波折，时起时伏，而且大多数规模狭小，技术落后。再次，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引发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买办资本和官僚资本的两重化发展，两者既相矛盾又相联系，在近代中国经济形态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尽管中国的资本主义在成长壮大，但居于绝对优势的仍然是封建地主经济和分散的农业小生产经济。这就说明，在经济结构上，中国已不再是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半封建社会；其另一半可以说是“半资本主义”，不过份量很轻。从政治结构上看，外国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又取得了协定关税权、管理中国海关权、领事裁判权（即司法权）以及建立租界、租借地和抵押借款等特权，逐步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使中国的主权遭到严重损害。清王朝以及后来的统治者尽管在不同程度上保持了自己的权位，但也不同程度地成了列强的工具（既相勾结又相矛盾）。这就说明，中国不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社会，而是半殖民地；其另一半可以说是“半独立”，只是比重较小。从文化结构亦即意识形态结构上看，儒学正统和固有生活方式受到无情冲击。随着西方先进文化知识、价值观念的传入，启示中国人面向西方寻找民族和国家的出路。于是，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发生变异，进化论、民约论、民权论、民主共和思想以及西方资产阶级的其他学说，开始取代孔孟儒学在许多人心目中的地位，从而形成一浪高一浪的革故鼎新的社会思潮。

总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很不平衡的畸型社会结构中，各种因素都非常活跃，呈现出交叉性、复杂性、急变性和过渡性。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当于资本主义阶段，但又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畸型的社会形态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它在客观上规定了当时中国的历史主题：一方面，要求反对封建主义，学习西方先进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和科学文化，发展资本主义，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另一方面，又必须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维护民族独立，避免资本主义的祸害。这是双重的历史主题。两者紧紧地扭结在一起，互相关联又相互制约，决定了当时中国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历程，必然会比其他国家更为艰辛、痛苦和曲折。

世界走向中国与中国走向世界

在中国与世界、尤其与西方的关系上，鸦片战争以后出现的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中国与世界发生了日趋广泛、密切的联系，中国成了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一员，成了世界中的中国。

当然，这并不是说在此以前中国与外部世界没有联系，也不是说中国一直置身于国际社会之外。事实上，中国与外国、中国人与外国人之间，很早就已有多方面的交通往来。但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一体化结构的稳固和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文明的早熟，中国人过多地沉缅于已有的成就之中，养成了安土重迁、知足常乐和内向保守的习性，缺乏向外部世界追寻先进知识和开拓海外市场的内在动力。因此，对外交往的目的大

都出于维护与亚洲近邻小国的宗藩关系和边境安全，或是为满足封建统治者的奢侈生活而搜求奇珍异宝，很少从发展对外贸易和社会经济着眼。同时，这种交往总是零星的、偶然的或暂时的，缺乏经常性、连续性或继承性，特别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更是如此。

在西方，由于多元社会结构的影响以及商品贸易、航海事业和世界性宗教的兴起，欧洲人很快形成一种外向、开放、冒险的性格。尽管中古时期中国的文明程度和发展水平高于西方，中国文化曾对西方有过重要影响，但在走向外部世界这件事情上，却不能不承认欧洲人的起步比中国人早。例如，在中西之间的人员往来上，“从公元166年大秦始通中国算起，之后整整15个世纪中，只见欧洲人‘自西徂东’来到中国，不见中国人‘自东徂西’去到欧洲。”^①其实，直至鸦片战争前，这种单向性的交往状况也没有多少变化。

自15世纪末16世纪初欧亚新航路开通以来，为了扩展海外贸易，积聚原始资本，西方海盗式的殖民者、商人、冒险家纷纷来到东方，闯入中国沿海。从1511年（明正德六年）葡萄牙人初至广州东莞境内屯门岛到中英鸦片战争，在这3个多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中国的综合国力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可以与任何新兴的西方势力相抗衡。在此期间，西方势力轻而易举地席卷了南亚和东南亚，却始终未能打破中国的“朝贡”贸易壁垒；武力入侵也有多次，最后都遭到反击而失败。西方商人的海上贸易终被限制在广州一隅，而且只能通过中国公行的“行商”进行。

面对西方势力东来的挑战，中国的反击和限制都意在自卫、自保，自有其不可否认的正义性。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丧失了自身发展的一切活力和对外贸易的良机，变得越来越颓废、守旧、落后。当初，西方商业资产阶级热衷于东方贸易，恰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契机；而中国又占有南洋贸易的优势，并对东西方贸易握有主动权。如果中国的统治者能趁势积极开拓新的远洋贸易，并善于汲取国际外交知识，灵活地处理对外关系，那么中国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新兴贸易大国，与西欧诸国并驾齐驱，平分秋色。然而，正当世界贸易由大陆转向海洋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在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工业革命之后，欧洲的科学技术和政治思想都有重大突破，清朝政府不但闭目塞听，反而与世界大势背道而驰，采取日益严厉的“海禁”政策。长期闭关锁国的结果，中国不仅丢掉了对外贸易的主动权和原来在南洋开辟的许多贸易基地，而且导致包括鸦片在内的沿海走私活动的猖獗，把本来有利的海上贸易变成了自己的包袱；不仅抑制了本国先进的工场手工业的发展，而且使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大大削弱了综合国力，拉大了与西方的差距。更有甚者，由于中国与世界几乎完全隔绝，中国人对世界的了解愈益模糊，以至达到茫然无所知的程度。直到1840年中英开战前，清廷还不知道英国在哪里。福建有个举人黄惠田上书说，英国人“由安海放桅而来，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口，方至息辣，过广南境七日而到广东。”如此荒谬的说辞，道光皇帝（1821~1850）竟认为是重要情报，特作批示说：“夷船既须放桅，其地又复黑暗，则路径窄狭，有妨挂碍可知。着祁埭等确切查明，据实入奏。”^②这种愚昧可

① 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5页。大秦：一般系指罗马帝国或其在西亚的属地。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3，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1617~1618页。

笑的现象，在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中是普遍存在的。

通过鸦片战争，英国用野蛮的炮火轰开了冥顽不灵的清王朝久已关闭的大门，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结束这场战争的中英《南京条约》（1842年8月）是中国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了中国对英割地、赔款、与英国协定关税等内容外，它还硬性规定了双方之间久远的国家关系。主要是：两国人民“各住他国”成为一种“条约权利”，英国人来中国不再是中国可不可以允许的事，而成了必须允许的事；清政府的官员，无论中央的或地方的，都不得再称英国为“英夷”，都必须平等地同英国派来的官员及其属员打交道，公文往来也要用平等的款式；中国必须向英国开放五口通商口岸（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并在五口接受英国常驻领事。1843年7月、10月，中英又签订了南京条约的附约《五口通商章程》、《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即《虎门条约》），英国利用清朝官员对国际事务的茫然无知，进而取得了领事裁判权、建立租界等特权。尽管引起战争的是鸦片问题，但双方对此都绝口不提。就这样，在鸦片恢复进口、而且比以前进口更多的情况下，两国间正式建立了有限度的关系，英国便成为第一个依据不平等条约进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一向颞顛自负的清政府在心里仍瞧不起英国，继续把英国称为“英夷”。

英国首先开道，其他国家接踵效尤。1844年7月中美签订《望厦条约》，10月中法签订《黄埔条约》，1847年3月中国与瑞典、挪威签订《五口通商章程》。这4个国家都分别从中国取得上述英国所得到的权利。

根据英法联军侵略战争（1956~1860）中所缔结的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结束战争的《北京条约》，中国不仅再次割地赔款，且又规定增开牛庄（营口）、天津、登州（烟台）、台南（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海口）等6个沿海口岸和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4个沿长江的口岸；英法商船可在中国内河自由航行；还规定英法使节可常驻中国京师，外国传教士可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这就更加扩大了英法两国进入中国的范围和程度。美国紧步后尘，也与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并根据在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原则，“一体均沾”了英法所得到的权利。

在英、法、美等国由海路进入中国的同时，俄国则从陆路边疆破门而入。通过逼签1851年8月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58年5月的《爱珥条约》、1860年11月的《北京条约》，俄国不但割去中国东北极其广大的领土，而且得以单方面在中国西北的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等处设领事“照管”贸易。这样，就造成了中国同时遭受由海上和内陆相逼而来的钳形压迫的局势。

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侵略战争彻底暴露了清王朝不谙国际事务、外强中干的本质。此后数年间，世界各地又有许多国家（包括一些弹丸小国）认准清政府软弱可欺，陆续遣使来华，要求议约建交。对此，清政府头脑发昏，手忙脚乱，既难以阻挡，也无法拒绝，只好一一与它们签订条约。1861年9月，中国与普鲁士（德国）签订《和好贸易船只事宜和约章程》；1863年7月，中国与丹麦签订《天津条约》；同年10月，中国与荷兰签订《天津条约》；1864年10月，中国与西班牙签订《和好贸易条约》；1865年11月，中国与比利时签订《通商条约》；1866年10月，中国与意大利签订《通商条约》；1869年9月，中国与奥地

利（奥匈帝国）签订《通商条约》；1871年9月，中国与日本签订《修好条规》；1874年6月，中国与秘鲁签订《通商条约》；1881年10月，中国与巴西签订《和好通商条约》；1887年12月，中国与葡萄牙签订《和好通商条约》；1899年12月，中国与墨西哥签订《通商条约》。所有这些条约，除了中日《修好条规》外^①，均属套在中国脖子上的不平等条约。如同英、法、美、俄一样，这些国家都先后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关系，并援例享有种种特权。显而易见，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到七八十年代，世界基本上进入了中国。当然，这许多国家都曾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只是侵略的程度、范围、方式各有差异。事实表明，英、法、美、俄，再加上稍后崛起的德国和日本，这6国是近现代史上侵略中国的主角；葡、比、意、奥等国居其次；秘鲁、巴西、墨西哥等国则较轻微^②。

世界进入中国，就使中国走向世界成为不可避免。鸦片战争以严酷的事实显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巨大落差，促使一部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爱国者向中国以外的世界睁开眼睛。但是，由于传统夷夏观念的根深蒂固和长期封闭环境的影响，中国人在走向世界的问题上仍障碍重重，犹豫踟蹰。1847年春，容闳等3人赴美留学，林鍼赴美游历，都得自外国人的偶然帮助或聘请，而非官方派遣。当时，清朝统治者中根本就没有人想过应派自己的代表走出国门，到已建立了正式关系的国家中去。可以说，中国走向世界的历程，又白白耽误了20年。

英法联军侵略战争结束后，开始了外国使节常驻北京、中外反动势力既相矛盾又相勾结的历史。为适应中外关系新形势的需要，1861年（咸丰十一年）清政府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这一专门与外国打交道的新机构。其职权大致相当于外交部，但又比外交部的权力广泛得多，实际上是总管一切“洋务”的机构。1862年（同治元年）该衙门在京师设立包括英、法、俄、德文课程的外国语学校——同文馆，着手培养外交人才。此后几年间，在外国人不断的劝告和要求下，清政府才似愿非愿地考虑派人出国。1866年，总理衙门派章京斌椿等随同在中国担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赴泰西“游历”，行经11个欧洲国家，费时不足4个月。这是第一批由清政府所派亲自接触和了解西方情况的代表。1868年，清政府以卸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为“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由总理衙门章京志刚等陪同赴欧美活动，劝说各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克制态度，迄1870年，历访美、英、法、普、俄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中国使团以外国官员为主组成，表现出一种历史的滑稽和调侃，反映了清政府在世界潮流面前半推半就、举步维艰的复杂心态。但这个使团毕竟是清政府向西方国家派出的第一个外交使团，并随着它的前往，在西方国家首次升起了中国的国旗（清朝的黄龙旗），因而在近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史上，还是有重要意义的。

① 1871年日本遣使来华，要求议订条约。日方所提的条约草稿集欧美各国对华不平等条约之大成，凡别国已有的各项侵华特权，日本都要“一体均沾”。清朝当权者在实践中已多少感知了这些特权的含义，遂对日本的要求予以拒绝。双方最后签订了平等的《修好条规》。参见张振鹄《论不平等条约——兼析〈中外旧约章汇编〉》，《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② 张振鹄：《近代中国与世界：几个有关问题的考察》，《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

中国派员第一次正式出使西方，是1870年天津教案发生后，清廷根据总理衙门的建议，特派驻天津的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为出使法国的钦差大臣，前去赔礼道歉。但崇厚还不是常驻国外的使节，他在完成了“道歉”的使命后就回国了。在此以前，中国海关已在伦敦设立办事处，主持者虽是外国人，机构本身则是中国的。1871年，清政府经曾国藩接受容闳建议，批准派遣幼童官费赴美留学；从1872年起，共有120名学生分4批逐年出洋（后因保守势力的疯狂攻击，1881年这些学生又全部被撤回）。1873年，中国第一次以土特产到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展出。这一切都反映了走向世界、直接与外部世界接触交流已成为大势所趋。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外国驻华公使的不断增多，清政府对此由无可奈何逐渐变得习以为常，因而向国外派遣常驻使节的条件日臻成熟。1875年清廷任命郭嵩焘为驻英公使，次年赴任；任命陈兰彬为驻美国兼驻西班牙、秘鲁公使。1877年任命何如璋、张斯桂为驻日本公使、副使；还任命了驻德国公使。1878年任命驻法国公使（由驻英公使兼）及驻俄国公使。同时，这几年来还向这些国家或其属地的一些地方派遣了领事。于是中国外交从单向发展为双向，中国也基本上走向了以欧洲为主体的资本主义世界，终于成为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一员。当然，这个过程还在继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也将日趋紧密。

由以上可知，世界进入中国，中国走向世界，两者有很大不同：一是时间不同，前者先于后者。二是方式不同，前者是主动的、急迫的、强制的，甚至凭借武力开道；后者则是被动的、迂缓的、和平的，有时又被迫实行武力自卫。三是性质不同，前者是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后者则是落后的中国在屈辱中为适应对外关系的新情况以求自保。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这种新变化，既加深了中国社会业已存在的矛盾，又给中国社会带来许多新事物和新的矛盾。中国就像一位仪态龙钟、横遭欺凌的老人，不得不蹒跚而行。她的社会变革和现代化进程，正是在这种新旧矛盾错综交织的状况下起步的。

早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就以间接获得的资料，把清王朝戏称为“活化石”、“木乃伊”。他还突发奇想，以深邃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对中国进行预言：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到这样的字样：

中国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①

对于曾经为人类贡献过高度农业文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来说，19世纪是她最屈辱、最羞愤、最痛苦的世纪。那么进入20世纪之后，她的前途和命运又如何呢？！马克思的预言能够变成现实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5页。

第一章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1901~1912)

第一节 世纪之交的国内外形势

一、资本主义列强对华侵略的加剧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欧美列强的对外侵略,其手段也由以商品输出为主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拼命争夺投资场所。自由竞争被垄断竞争所代替,竞争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竞争了。这时,世界上绝大多数未被占据的国家和地区已被列强瓜分完毕。于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物产丰饶、人口众多而又贫穷落后的东方大国,就成了如狼似虎的列强激烈追逐的中心目标。从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外来资本主义在中国掀起了竞相投资和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进程和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更加严重的影响。

与中国隔海相望的东亚岛国日本,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19世纪中后期明治维新以前,它同中国一样,也处于封建社会的末世,出现了因闭关锁国和欧美列强的侵袭所造成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然而,1868年明治天皇政权建立后,落后的日本却顺应时代潮流,在积极学习西方和全面改革中迅速崛起。通过改革,日本不仅修改了原来与欧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奇迹般地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厄运,恢复了民族独立,而且用了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实现了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并脱亚入欧,一跃而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强国之列。甲午战争之前,日本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由于其政治、经济等方面仍保留着大量的封建残余,加之自然资源又十分贫乏等因素,就很快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几乎与日本明治维新同时,清朝的洋务派官僚在“求强”、“求富”的口号下,搞了一场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性企业,揭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序幕。但是,由于只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而不变革封建的政治经济制度,因而与日本的改革形成巨大反差。这场洋务运动虽然持续了30

年，中国不但没有富起来，反而在半殖民地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当时，远东的国际形势是，随着世界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过渡，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在这里展开了日益激烈的争夺和角逐。1891年，沙俄宣布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想在朝鲜占领一个港湾，作为太平洋的出口，以增强其在远东的实力。此举如若实现，势必威胁到在中国享有最多侵略权益的英国的优势地位。因此，英国就想利用日本作为对抗俄国的前哨，希望与日本接近。1893年，英国开始与日本谈判改订条约，并于次年7月16日在伦敦签字。英国外相在签字仪式上致祝辞说：“这个条约的性质，对日本来说，比打败中国的大军还有利。”^①这就表明，英国完全支持日本，鼓励日本发动战争。美国是另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在19世纪后期发展迅速，工业产值已超过当时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跃居世界首位，并先于英国而走上垄断阶段。为了尽快向远东伸展势力，获得新的投资场所，它同英国一致，竭力支持日本侵略朝鲜和中国。法国在中法战争后，也有意利用日本侵华之机，以扩张它在中国西南各省的势力。至于德国，同样觊觎着朝鲜和中国的权益，企图在日本侵华的时候趁火打劫。日本正是利用这种有利于己的远东国际形势，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甲午战争从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农历甲午年）7月25日日本武装偷袭起，8月1日清政府被迫宣战，到1895年3月止，共进行了八个多月。这是中国用新式武器与外敌所打的第一次现代化战争。就当时中日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说，中国并非完全处于劣势，如陆军的总兵力、海军舰队的总吨位数均占压倒的优势，财政状况亦较充裕等。但是，由于清王朝的极端腐败，既轻视日本，又认识不到自己的虚弱，没能动员全国军队一致抗敌，仅将赌注押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淮军和北洋海军身上，加之慈禧太后和李鸿章一味推行妥协投降政策，致使中国在战争中连遭惨败。清政府被迫乞和，于同年4月17日由李鸿章（73岁）在日本马关（今南京市下关）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55岁）签订《马关条约》。其主要内容是：

1. 清政府承认原为中国藩属的朝鲜“独立自主”，实际上是把对朝鲜的控制权让给日本。
2. 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
3. 赔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亿两，第一年交一半，余分6年交清，未交清前每年须偿付利息5%。
4. 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船沿内河驶入，并可搭客载货。
5. 允许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意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可将各项机器任意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中国制造的货物，与进口货物一样，免征一切杂税，并准在内地设栈寄存。

中日甲午战争是继中英鸦片战争以来又一次最严重的历史事件，而《马关条约》则是继《南京条约》之后又一个创巨痛深的卖国条约。从此，外来资本主义的对华侵略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投资竞争和割地狂潮接踵而来，大大加深了中国殖民地化的程度。

① 井上清、铃木正四：《日本近代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195页。